

“嘉峪关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略河西走廊

吴敏超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东部大片领土被日军占领,西北成为国民政府抗战建国之重要基地。1941年,国民政府开始着力经略河西走廊,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前往甘青宁三省,游说马步芳、马步青兄弟换防。1942年,中央军入驻河西走廊,蒋介石巡视西北一个月,密切中央与西北各地的联系。国民政府加强在河西走廊的军政控制,对于解决新疆问题、维护西北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嘉峪关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的提出,一改国人视嘉峪关外为偏远之地的既有看法,显示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边疆的重视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之决心。

【关键词】抗日战争;河西走廊;蒋介石;吴忠信;马步芳

【作者简介】吴敏超,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01)。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22.12.57~6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疆历史问题专项“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疆研究”(21VXJ015)。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之后再迁至重庆。中国东部的大片国土沦丧,国民政府不得不将西南和西北作为抗战建国之基地,苦撑待变。西北的国防、政治地位快速上升^①。不过,抗战前期,西北的大部分区域内地方军阀势力较强,青海、甘肃河西走廊是马步芳和马步青的势力范围,宁夏省政府主席为马鸿逵,新疆则由盛世才控制。其中,盛世才和上述三马又有所不同:盛世才自1933年主政新疆后,在苏联的庇护下俨然当起“新疆王”,对国民政府的政令采取漠视态度。苏军在新疆东部的哈密驻扎了配有重型武器的加强团,扼守从中原经由甘肃河西走廊前往新疆的道路。位于甘肃西部的河西走廊不仅是内地连通新疆的孔道,还南通青海,东北连宁夏,北接蒙古,为重要战略地带。欲使新疆稳定、西北发展,国民政府必须先全面加强在河西走廊的军事控制和政治统治。目前学界有关新疆问题的研究较为充分,但对国民政府经略河西走廊涉及较少^②。本文利用海峡两岸档案和新近出

版的《吴忠信日记》等资料,探讨1941—1942年国民政府控制和稳定河西走廊的具体进程,认为此举成为国民政府解决新疆问题、促进西北开发的先决条件。

一、吴忠信游说马步芳与中央军入驻河西走廊

1941年夏,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无暇顾及在新疆的不正当利益,盛世才当局与苏联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从这时起,蒋介石对新疆问题进行反复考量^③。蒋介石明白,要解决新疆问题,促使新疆内向,必须以相当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当务之急是使中央军入驻河西走廊,掌握随时从内地进兵新疆的通道。1941年9月,蒋介石决定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率团到甘肃、宁夏、青海三省进行党政考察^④,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笼络马步青、马步芳兄弟,说服其调防,让出河西走廊。10月4日,蒋介石专门分电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希望他们竭诚接待甘青考察团^⑤。吴忠信是辛亥元老、蒋介石信任的幕僚,又

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代表中央政府顺利主持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维护了中央在西藏的权威。蒋介石请吴忠信以党政考察的名义前往甘宁青,与马步芳兄弟、马鸿逵协商沟通,应为深思熟虑的结果。

10月23日,吴忠信由重庆飞兰州,开始为期近两个月的考察。兰州是西北重镇,亦是当时国民政府军政力量所能控制的西北前哨。考察团以励志社为办公地点,向西北军、政、文化宗教各界人士广泛了解情况,并分组考察党务、财政、教育等各领域。11月3日,吴忠信代表蒋介石祭祀成吉思汗陵^⑥。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防止日军占领成陵借以利用蒙古族民众,国民政府于1939年将成吉思汗的灵柩等从绥远的伊克昭盟(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迁至甘肃兰州附近的榆中县兴隆山。3日当天的祭祀仪式隆重盛大,这是中央第一次派大员主持成陵的祭祀仪式,表明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对边疆地区和民族团结的重视。11月9-17日,吴忠信一行赴宁夏考察。11月21日,考察团抵达青海西宁,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隆重招待考察团一行。11月23-29日,吴忠信在考察之余,多次与马步芳长时间恳谈,一方面肯定马步芳与兄长马步青在河西走廊修路、植树、维护国际交通线畅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希望马步芳密切与中央的关系,赴重庆谒见蒋介石。马步芳自1933年到过南京后,8年来未曾前往中央,一般舆论对此也多有猜测。马步芳提出,从西宁到重庆路途遥远,汽车费时太久,坐飞机容易晕机,除非乘坐专机前往重庆,并在兰州和成都分别停留,略作休息。吴忠信一一答应,接着又进一步提出实质性问题:鉴于河西走廊在西北的枢纽地位和玉门油田在国防上的重要意义,请马氏兄弟的军队调出河西走廊,将青海作为主要基地长期经营,将来可继续对西藏和新疆南疆地区负一定责任。另外,考虑到河西走廊本为二马军队的粮食供应地,作为补偿,中央将对二马军队发饷发粮^⑦。11月29日,马步芳和吴忠信分别致电蒋介石,报告两人的会谈情况。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决定照中央军标准发给二马军队粮饷^⑧,希

望二马军队向西(指新疆)立功^⑨。

12月上、中旬,吴忠信考察河西走廊的武威、山丹、张掖、高台、酒泉,及玉门油田等地,其间在武威与马步青见面会谈。马步青表示,中央如要用武力促使新疆内向,他可担任前锋。吴忠信表达赞许之意,不过并未透露与马步芳商量的二马部队调出河西走廊之事。半个月的河西之行,使吴忠信切身体会到河西走廊在西北的重要地位,并认为安西(今甘肃瓜州)和敦煌是河西走廊的西北门户,兰州为河西走廊的东南门户。吴忠信对安西和敦煌的军事战略和经济意义亦多有肯定,“安西西去嘉峪关约四百公里,濒疏勒河附近,水利颇饶,为甘肃西北之重要水草田。自此以西皆为砂碛,直至哈密,方见园林。敦煌位安西西南党河中流,水草肥美,又据汉代长城之西端,自汉以来,历代皆为屯戍之区,军事重镇,诚国防之要冲也。”^⑩可见,安西与新疆哈密之间的地区较为荒凉,军政人员欲前往哈密,安西和敦煌的绿洲是重要的补给基地,即中央军进兵新疆的前沿阵地。由于吴忠信须陪同马步芳前往重庆,在考察酒泉和玉门之后即东归,他未能亲往安西和敦煌。在视察河西走廊的10多天里,吴忠信不断与蒋介石、陈布雷、马步芳通电报,妥善细致地安排马步芳的重庆之行。12月17日,吴忠信等一行人陪同马步芳飞抵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18日,蒋介石即宴请马步芳,以示优待之意。马步芳留渝期间,吴忠信、何应钦等先后与其会谈,商定调整青海的军政办法等。双方最后拟定的草案主要内容有:河西走廊军队撤回青海,由中央军另派军队接防;粮饷方面,此后青海军队与中央其他部队享受同一待遇;骑第5军军长马步青任柴达木屯垦督办;青海军队担负对西藏及新疆南疆之国防责任;青海政费由中央酌予补助^⑪。这一草案与吴忠信和马步芳在西宁时的最初协商内容和精神基本一致。12月26日,马步芳准备离渝返青,蒋介石约其单独谈话,并共进晚餐^⑫。蒋介石在12月“本月反省录”中认为,马步芳“来渝述职,其对中央,当能改变过去观念,此乃为西北重要政策也”^⑬。在马步芳与中央加强联系的过程中,可

以说,吴忠信的沟通劝说发挥了关键作用。

马步芳同意二马军队调出河西走廊的原因,可能有三点:第一,从抗战以来的大趋势看,中央对西北的控制力逐渐提升。马步芳清楚,经由河西走廊进一步加强对新疆的控制,对国民政府而言势在必行。石油是战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玉门油田的大规模开发,也是中央军须掌握河西走廊的关键因素^①。第二,马步芳为青海省政府主席,青海为其主要地盘。由马步芳指挥的驻在甘肃河西走廊的部队为张掖的第82军第100师,而第82军军部在西宁,第100师回到西宁,名义上较为顺畅。此时马步青的主力部队骑第5军主要驻在武威、骑第5军第5师(师长马呈祥,为马步青女婿)则驻在酒泉,马步青自己长居武威。事实上,让出河西之举关涉马步青的利益更大,对马步芳影响相对较小。这也应是吴忠信到武威与马步青会谈时没有贸然提及请他让出河西、前往青海柴达木屯垦的原因。第三,为了对二马部队调出河西走廊有所弥补和安抚,国民政府给予马步芳若干好处。近期看,马步芳的部队获得中央军标准的粮饷,青海省政府得到更多补助;长远看,国民政府允诺马步芳以后参与新疆南疆和西藏事务。马步芳于1941年年底返回西宁后,很快布置调防事宜。按照在重庆的约定,他和马步青部队的调防顺序是先调自己部队回青海西宁,再调马步青的骑第5军到柴达木,且在行动之前严格保守秘密^②,为的是防止马步青抵制国民政府的命令。1942年1月,马步芳的第82军第100师(师长韩起功)从张掖返青,中央军骑兵第10师(师长谭辅烈)从甘肃静宁出发,3月上旬全部开抵张掖防区。4月,国民政府令马步青的骑第5军移驻柴达木屯垦,国民政府暂编第58师(师长叶成,移防前驻天水)接替骑第5军直属部队武威、永昌、山丹、民乐各地防务,新编第18旅(旅长徐汝诚)接替骑第5军第5师的酒泉防务。7月,换防基本完成。截至1942年8月底蒋介石巡视甘肃时,骑第5军驻河西部队只剩驻敦煌、安西一带的第5师第13团^③以及驻永登的暂骑第1师一部。原来,1941年年底蒋介石与马步芳在重庆时即约定敦煌与

安西部队暂时缓调,可能考虑到一则中央军到甘肃的西北角接防,路途遥远,需要较长准备时间,二则敦煌、安西与柴达木盆地地理上接近,部队可直接翻越祁连山前往柴达木屯垦。1942年11月,中央军第42军第48师(原驻兰州,师长罗列)接替第5师第13团的防务,师部驻玉门,第142团驻敦煌,第143团驻安西,第144团驻玉门赤金堡^④。至此,整个河西走廊已基本由中央军接防。

中央军开入河西走廊,自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尚属首次,表明中央对河西和整个西北的统治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央军之所以能较为顺利地入驻河西走廊,一方面,是这些部队本属第八战区,原驻甘肃兰州、静宁、天水等地,距离河西并不遥远。这也是蒋介石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胡宗南长期经营甘肃打下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央军移防过程中,蒋介石格外注意对二马取谨慎态度,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刺激与反抗。1942年5月,马步芳第100师驻张掖留守处主任被杀,蒋介石致电朱绍良彻查,并及时与马步芳沟通^⑤。6月2日,蒋介石令朱绍良、谷正伦、谭辅烈纠正反马言行,“凡与马主席兄弟不协调或有旧嫌之人,皆应调回兰州候用,不得再留河西……力加保护其留驻人员。如绘画标语有侮辱回教与马主席兄弟情形时,应一律禁止,并负责撕毁”^⑥。7月,蒋介石为安抚马步青,促其早日前往柴达木屯垦,专门派人携带自己的亲笔信前往武威,信中写道:“世界多故,正吾人为国建业之秋,兄在河西政绩斐然,军纪卓著……此次进驻柴达木,甚望运用特殊之资以成非常之功也。”^⑦蒋介石还允许甘肃临夏马步青的部队继续驻扎。临夏是近代西北诸马的发源地,也是马步青的出生地,对他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后来马步青无法在青海立足后,便长期居住在老家临夏。河西走廊是蒋介石的必争之地,但在争取过程中采取了相对和缓的态度,对二马兄弟在表面上始终持尊重之意,背后亦透露出国民政府加强西北控制的深思熟虑。正是在河西走廊换防基本结束、盛世才与中央继续接近的情况下,蒋介石于1942年8-9月携夫人宋美龄巡视西北。

二、1942年夏蒋介石巡视西北

1942年8月蒋介石巡视西北,成为国民政府经营西北的关键一步。此行是蒋介石第二次巡视西北,距离1934年10月的陕甘宁之行,已相距8年。8月15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由重庆九龙坡起飞,下午1点半飞抵兰州。在此后的近一个月里,蒋介石先后视察西宁、嘉峪关、玉门、酒泉、张掖、武威、银川、西安等西北重镇。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新疆问题与促进西北开发。

8月19日,奉蒋介石之命先期与盛世才密谈的朱绍良从迪化(今乌鲁木齐)飞回兰州,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朱绍良与盛世才早年相识,盛世才曾担任朱绍良女儿的家庭教师,而朱绍良又是蒋介石信任的高级军官,最适合在中央与新疆地方之间联络协商。蒋介石虑及迪化机场的安全问题,决定由宋美龄代表自己赴迪化,向盛世才传达意旨,坚定其内向中央的意志,“以壮盛胆,亦所以慰之也”^①。在赴西北之前,蒋介石虑及苏联在新疆长期侵略打下的基础,决定在新疆内向问题上采取温和态度,一方面保全盛世才的地位,一方面使苏联不致因新疆问题而恼羞成怒,采取过激手段^②。

8月20日,蒋介石再次拟定解决新疆问题的程序,包括派第八战区第42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便于应对新疆哈密的苏联军队等^③。第42军军长杨德亮是回民,信仰伊斯兰教。杨部是蒋介石较早派驻到兰州的中央军,此次驻防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后来又进一步西开新疆。联系上文谈到的河西走廊换防问题,蒋介石此行加速了嘉峪关外安西、玉门、敦煌等地的换防进程。正如吴忠信所说,安西和敦煌是河西走廊的西北门户,控扼进入新疆的通道。蒋介石以保护玉门油田为名进一步增兵嘉峪关外玉门、敦煌和安西等地,使中央军可较为迅速地从嘉峪关这一前沿阵地抵达新疆哈密。

8月22日,蒋介石专门在日记中写下马步青撤防河西的重要意义。马步青“撤防河西,移驻柴达木屯垦,此其关于统一西北、收复新疆之效用实非浅鲜,殊为抗战中最大之成就也”^④。蒋介石将马步青

(和马步青)撤防河西视为抗战时期的最大成就,或许有夸张之处,但若考虑到民国以来绝大多数地方军阀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地盘、不轻易让中央染指的事实,此次蒋介石能以和平手段使二马的军队撤出河西走廊,其欣喜激动之情可想而知。国民政府在全民族抗战的背景中经略河西、巩固西北边疆,确实取得了相当成绩。中央在西北军事和政治的扩展,必须在经济、文教和社会诸方面进行相应配合。8月23日,蒋介石在兰州参观农业、交通、建设等展览会,感受到甘肃的物产丰富和近年来开发之迅速。当晚,蒋介石又对西北造林、水利、畜牧和交通等进行综合思考,并做出三项决策:“一、西北文化团体之指导与组织应速着手。二、文化团体应以喇嘛为中心,推及回、蒙各民族与宗教为方针。三、拉卜楞寺与敦煌为组织之基地。”^⑤可见,蒋介石虑及西北地区的特殊性,尤其关注文化、宗教问题,计划将拉卜楞寺与敦煌作为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组织基地。这也表明蒋介石对西北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全盘考量。8月26日,蒋介石由兰州飞西宁,会晤马氏兄弟。事实上,蒋介石初到兰州的第二天,马步青、马步芳即来兰晋谒。这是蒋介石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青海。飞机落地西宁之前,特在青海湖海心山上空盘旋,机上人员欣赏了湖光美景。次日,蒋介石到马氏兄弟父亲马麒墓祭祀,下午携宋美龄游塔尔寺宗喀巴殿和小金瓦寺,并赠送10万元,表明其对马氏父子和当地宗教的尊重。28日上午,蒋介石与马步芳、马步青谈话,勉励他们合作共济、为国立业发展,如全力开通西宁至玉树的公路,贯彻对西藏以政治统制为本、军事为辅的方针等^⑥。此时,蒋介石考虑借助二马在青海的力量,推行由青入藏之方略。由青入藏与由河西走廊入新疆以及笼络二马与保持盛世才的地位等,都反映了国民政府对西部边疆地区徐徐深入、加强治理的意图。限于各方面的环境,中央势力扩张的同时保持平稳姿态和妥协态度。

8月28日中午,蒋介石由西宁飞嘉峪关。当日,蒋介石在新近调防到此的新编第18旅旅长徐汝诚的

引导下,登上酒泉城钟楼。徐汝诚是浙江余姚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炮科毕业生,为胡宗南手下的一名干将,后升任第42军第46师师长。蒋介石“登楼远眺祁连山雪峰连迤,山腹云海弥漫,更见其雪峰之秀丽可爱,其西侧则为贺兰山脉之合黎山麓,嘉峪关即在祁连与贺兰两山口之间,平坦浩荡,其正面之宽约卅里至五十里,诚中华西部大关阕也”^②。此处所见的壮丽景色,给蒋介石留下深刻印象。蒋介石在酒泉时还到西北干训班考察,对蒙、藏、回边疆学生180人点名训话^③。在此后的三四天里,蒋介石巡视玉门油田、张掖、武威,这是他第一次踏足河西走廊,加上中央军已经入驻,胡宗南等干将陪同视察,心情豁然开朗。他对各地中央军的检阅和训话,召集相关负责人谈话等^④,也增强了中央军驻扎河西走廊的信心和责任感。9月1日,蒋介石离开甘肃前往宁夏时,认为“此次巡视河西、宁、青,比廿四年巡视甘、陕、晋、绥之意义与成效更大,廿四年乃为决定抗战国策之最大因素,而今则为抗战决胜,巩固西北唯一之实力也,此行为收获最后胜利必不可少之行动也”^⑤。可见,此时的蒋介石对于抗战胜利充满信心。确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美、苏、英、中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中国赢得抗战胜利已是指日可期。蒋介石此次巡视西北,谋划边疆之巩固发展,促使西北成为抗战建国的基地,可谓踌躇满志。不过,驻防河西走廊的中央军也有让蒋介石担忧之处,一是将领不得力。蒋介石到张掖时,第10师师长谭辅烈在当地清道戒严,街上几乎没有百姓。蒋介石认为此“形同往时军阀之出行”,责骂谭辅烈无常识、愚拙,不堪任用。二是士兵精神、技术低劣^⑥。谭辅烈是江苏人,黄埔一期毕业。蒋介石感慨道,河西中央军的纪律精神,反不如往日二马部队,可知中央军的腐化日甚一日^⑦。因此,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对入驻河西的中央军屡有筹划。他多次指示何应钦给增防的第42军发放御寒装备和武器^⑧,计划在河西各镇建筑营房和操场,并决定西北地区以驮马代壮丁^⑨。另外,蒋介石对河西各镇的市容、卫生状况也很不满意。如张掖孔庙破败不堪,让蒋介石感

到痛耻之至^⑩。

9月13日,蒋介石即将结束一个月的西北之行,西北的雄壮辽阔激发他形成一个宏伟蓝图:中国应以天山与昆仑山为西部国防之锁钥,而以阿尔泰山与喜马拉雅山为其屏藩(外卫),东部以鸭绿江与黑龙江为国界,而以长白山与内、外兴安岭为锁钥,东以山海关外东三省为东花园,西以玉门关、星星峡外新疆、西藏为西花园,即以新疆为我国前门之广场,而嘉峪关实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⑪。

将嘉峪关视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反映了抗战期间中国人自信心的提升。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深重危机走向复兴的转折点。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是明朝开拓西域的前方大本营。嘉靖年间(1522-1566),国力衰退的明朝已无力经营西域,面对游牧部族的经常性袭扰,嘉靖帝下令将嘉峪关外的军政机构与臣民一并回迁,据关以守。嘉峪关外的玉门、安西、敦煌渐渐被边缘化。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国力强盛,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治理力度不断加强。近代以来,中国东部受欧风美雨的影响,相形之下,西北显得更加落后与闭塞。加上强邻环伺,中国西北、西南边疆危机严重,中央政权无力进行有效应对。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成为抗战大后方,并起到连通国际交通线的重要作用。同时,玉门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敦煌的艺术和文化价值也为世人熟知,各种考察团接踵而来,西北的重要性大大增强。蒋介石在巡视西北的过程中,认识到西北对于国家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性,倡导民族团结,着手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设。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未来的中国以嘉峪关为东西干线之中心,那么河西走廊和西北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了。中央军入驻河西走廊后,整顿社会治安、促进文教发展,将河西走廊作为新疆内向的基地,成为应有之义。

三、改善河西走廊的社会治安

河西走廊在中央军入驻之前,存在军政分立、社会治安不良等问题。1933年至40年代初,国民政府先后任命朱绍良、于学忠、贺耀祖和谷正伦担任甘肃

省政府主席。他们基本能在政治上号令全省,任命各县县长等。不过,因中央军基本驻扎在甘肃东部的兰州和陇东地区,省政府对于二马军队驻扎甘肃西部河西走廊的政治管控和社会治理,终有鞭长莫及之感。特别是河西走廊张掖和酒泉地区的东迁哈萨克人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中央军入驻河西走廊后,军政协调加强各方面管理,尤以妥善安置东迁哈萨克人为重点。

这一问题起因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张掖和酒泉地区,特别是嘉峪关外的敦煌、安西和玉门等地有大批哈萨克人从新疆迁来^①。据统计,1936-1939年,先后有二批新疆的哈萨克人因不满盛世才征税、强迫儿童教育等政策,迁入甘肃,共计11680人^②。哈萨克人以游牧为生,他们驻牧于肃州、安西、敦煌、玉门一带南山中,因初来乍到,没有固定牧场,有时与当地半牧半农的蒙古族和藏族人民产生争执,有时也进入平原地区活动,威胁到西北交通线和玉门油田的安全,成为该地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甘肃省政府的应对方策最初以安抚为主,如发放赈款、划定牧区等,安置迁甘哈萨克人。1936年11月,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派专员杜延年在玉门县鱼儿混(即鱼儿红)一带向哈萨克人发放赈款2000余元;1937年,甘肃省电告等七区(即酒泉地区)专员曹启文采取怀柔政策,驻防酒泉的第100师第298旅旅长马步康(第100师师长韩起功驻张掖)安抚哈萨克人,并派边务研究所学员郭曙南(随后任敦煌县长)发放赈款1000元,划鱼儿混地区东至大泉口、北至二道河、南至讨来为入甘哈萨克人的牧地,准其免税三年。第三批哈萨克人入甘后,甘肃省府于1938年2月设置哈萨克人管理局,驻地在玉门县昌马。1939年2月,省政府派第八战区少将参议金在治担任“哈萨宣抚专员”,他还专门前往新疆商洽哈萨克人问题^③。不过,哈萨克人管理局因经费有限、会说哈语的得力人才缺乏等,运行不畅,三年后被裁撤。1941年11月,吴忠信在兰州时还与金在治谈话,认为金在治有关西北问题的主张与他大致相同^④。总体而言,省政府的安抚政策力度较小,收效

甚微。

马氏兄弟的驻军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军事镇压,并要求政府方面供应相关资源。1939年7月,马步康旅获准添募骑兵一团,以增强防哈力量。马步康要求敦煌县长郭曙南招送壮丁20名。1940年7月,马步康下属马正财连奉令从敦煌出发,前往青海台吉乃镇抚哈萨克人,请时任敦煌县长的章朗轩准备马掌300付、骆驼200只、骡马100头,以便运输粮秣。1940年冬至1941年春,第100师师长韩起功多次往返张掖和酒泉之间,主要任务是镇抚哈萨克人^⑤。不过,哈萨克人常活动于甘青新边区三不管地带,以游牧为生,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虽然省政府和当地驻军数年内剿抚并用,仍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对于保持交通线畅通、开发西北等产生不利影响^⑥。

1942年,随着中央军的入驻,蒋介石决定彻底解决河西走廊的东来哈萨克人问题。1月19日,蒋介石分别致电军政负责人朱绍良、谷正伦,指出哈萨克人在甘肃敦煌、安西一带活动,“希迅即转飭甘青两省府切实查明哈民在各该省境内何部安分守己?何部肆行劫杀?其安分守己者应该两省府指定水草丰富、离公路较远之适当区域,使其游牧”^⑦。可见,蒋介石采取的还是剿抚并用的方策,安分者抚恤,令其在离公路较远、有水草的地方放牧,少数劫掠者镇压。4月4日,蒋介石再次致电朱绍良,询问盘踞在青新边境大曲莽山一带的哈萨克人的具体人数,要求采取措施以维护后方安全^⑧。朱绍良在回电中报告三省边区的哈萨克人有四股,其中三股在敦煌西南或南边,一股在玉门南边,共计14000人^⑨。考虑到从新疆进入甘肃的哈萨克人万余,这一数字可能有夸大之处。

5月14日,谷正伦向蒋介石报告,骑第10师(中央军)和骑第5师(马步青军队)分别负责防守东西两区,维护交通,第七区设哈萨克人管理科^⑩。5月19日,蒋介石指示朱绍良和谷正伦拟定救济哈萨克人的具体办法及编练经费^⑪。第二天,谷正伦即回复,需要救济的哈萨克人约有5000人,计划每人一次发

给救济费20元,每月发给食粮4市斗,维持至明年春耕。之后,政府寻觅及决定安置地点,化整为零,化聚为散,每地不得逾帐篷500顶,距公路约20里外^⑧。随后,蒋介石亲自核定第八战区司令部拟定的哈萨克人安抚与管理暂行纲要草案,以招抚为先决条件,必要时再清剿镇压,其方法为统制头目、化整为零、编制保甲、变牧为耕等^⑨。当然,后来的事实说明,编制保甲、变牧为耕对于游牧民族很难施行。不过,招抚方略中的统制头目政策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1942年春夏之交,中央军新编第18旅徐汝诚部接防酒泉地区。该军会同甘肃保卫处长吉章简、第七区专署参议孙得源入山招抚哈萨克人。后讨来川哈萨克代表到酒泉,向徐汝诚和专员曹启文呈文,表示归顺之意,愿意编查户口、接受赈粮^⑩。1942年9月,杨德亮率中央军第42军驻防河西走廊,第191师负责嘉峪关外的防卫。杨德亮以回教徒的身份邀集各民族上层人士座谈,表示要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各民族利益,消除各民族人士之间的疑虑。1943年夏,杨德亮发动酒泉党政机关、玉门油矿等筹集资金,在酒泉郊区举办为期三天的物资交易和赛马大会,哈萨克族、蒙古族、裕固族等群众都赶着牲畜、驮着山货来参加。第42军还进行了步炮兵军事大演习,宣耀军威。杨德亮给赛马优胜者颁奖,各族头人则向杨德亮敬献哈达和礼品^⑪。此次交流有利于稳定河西走廊西部的政治形势。

蒋介石巡视西北后,用于安置甘肃哈萨克人的经费较为充足。如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共15个月里,先后两次拨发经费计3188420元,小麦计33414石。规定的安抚时间也延长至1945年8月^⑫。不过,东来哈萨克人问题并没有随着安抚力度的增大而彻底解决。1944年6月,基于安西星星峡段有大批哈萨克人活动,朱绍良电飭驻酒泉的第191师派一个团开驻安西,协助新第45师一部防范处理^⑬。莫高窟所在的敦煌地区仍然有哈萨克人活动。1943年春,历史学家向达在致中央博物院曾昭燏的信中,几次提到千佛洞附近的哈萨克人^⑭。因有驻军的保护,哈萨克人未在千佛洞长时间停留。哈萨克人的活动

也影响到学者在敦煌附近的考古工作。1944年11月,考古学家夏鼐等人从事考古挖掘时,需要军官带领一队士兵随行予以保护。当地老百姓见到夏鼐一行人带着枪,误以为是哈萨克人,赶紧飞奔而逃,连正在放牧的牲口都弃之不顾^⑮。可见,此时的社会秩序仍不安靖。

全面抗战时期,河西嘉峪关外先后由马步芳、马步青军队和中央军驻防,入甘哈萨克人引起的妥善安置和社会治安问题令甘肃省府、第八战区颇为费神。中央军入驻后,在蒋介石的多次督促下军政合力,安抚力度加大,情形有所好转,但仍未能彻底解决。这一社会治安问题,与当地政治与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活方式等有关,需要绵绵用力,长期投入。

四、结语

西汉以来,河西走廊一直是中国内地与中亚、印度和欧洲之间物资和文化交往的主要通道。海运兴起后,河西走廊沟通中国内地与世界的作用有所降低。不过,河西走廊仍是从内地进入新疆的孔道,为西北枢纽所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河西走廊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国人认同。从国际交通线的一环甘新公路的快速贯通,到玉门油田的开发,再到敦煌国立艺术研究所的建立,河西走廊一次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央军入驻河西走廊和蒋介石、吴忠信等政要的巡视,进一步密切了河西走廊与内地的联系,加强了国民政府与地方军阀马氏兄弟的关系,促进了嘉峪关外的社会治理,更为随后国民政府大批军政力量进入新疆铺平道路。当然,国民政府经略河西走廊的成败得失,可作具体深入分析。

首先,国民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关系复杂微妙。一般而言,地方军阀既渴望仰仗国民政府的声威,获得若干实际利益,又担心地盘被侵蚀,实力被削弱。马氏兄弟同意换防、让出河西走廊,内心多少有些迫不得已。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无暇顾及在新疆的不正当利益、马氏兄弟之间存在的矛盾与竞争关系、吴忠信的成功游说和国民政府对马步芳的有力补偿等,是中央军开入河西走廊的远因背景与前

提条件。另外,换防工作分批次秘密进行,胡宗南陪同蒋介石检阅巡视新入驻的中央军,国民政府为此次换防过程中损失较大的马步青保留临夏老家地盘作为补偿等,均显示了各方实力变化过程中彼此保持谨慎和相对平衡的重要性。

其次,国民政府对统治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的西北地区有所思考和努力,但时间过于短暂。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为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以汉族为主体。随着战争爆发和战局演变,政府统治深入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这是对统治能力的挑战与考验。蒋介石将敦煌和拉卜楞寺作为西北文化与宗教的组织基地,源于认识到妥善处理西北民族、宗教、文化等诸问题的重要性。国民政府派出回族将领杨德亮统率中央军第42军驻防河西走廊西部、对哈萨克人以抚为主的政策等,体现了政府处理边疆问题的慎重立场,整体而言也产生了一定效用。不过,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收复东部沦陷区,对西北的重视程度大大降低。之后解放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再无西顾。国民政府在时局形势变迁中“重视西北”又“轻视西北”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和反思。

最后,客观评估国民政府对河西走廊的总体治理能力。一方面,甘新公路贯通、玉门油田开发、中央军入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政要和各类考察团的到来,确实让河西走廊人气渐升,与中央和广大内地的距离进一步拉近。蒋介石认定东北三省、新疆、西藏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将时人心目中偏远的嘉峪关视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成竹在胸。另一方面,战前和战时开发西北的舆论声浪大大超过实效,国民政府没有实力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西北进行大规模建设和开发,其统治也未能深入河西走廊的基层社会,加之落后的经济和交通设施、干旱少雨的气候、地理上大片戈壁荒漠等,大大制约了开发进程。因此,抗战胜利后,从地理上而言,嘉峪关确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但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西北地区在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层面并未取得明显进步。

注释:

①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和民众对西北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开发西北的声浪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蔚为大观,是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西北作为抗战建国基地的远因与背景。因篇幅所限,本文将讨论的时空范围集中于20世纪40年代前期的河西走廊,对战前和战时开发西北的舆论与举措不赘述。

②关于新疆内向的研究,有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第95~104页;左双文:《盛苏新疆交恶与国民政府对苏外交》,《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第80~90页。与国民政府控制河西走廊相关的研究,侧重于从经济方面研究蒋介石西北之行的意义,如刘进:《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青社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潘晓霞:《抗战主题下的建国努力:1942年蒋介石西北之行》,《兰州学刊》2016年第7期,第78~87页等。

③蒋介石在1941年7月的大事预定表中,有“新疆问题之研究”;7月14日,进行“中共问题与新疆问题之研究”;7月19日,有“新疆方面军政计划之准备”;8月大事预定表中,有“西北新疆兵力与将领之准备”和“西北与东北、外蒙之政策与战略”之记录;9月17日下午,蒋介石“研究外蒙与新疆问题”;9月27日,又有“新疆问题与驻新人员之研究”[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④⑥⑦⑩王文隆主编:《吴忠信日记》(1941),香港:开源书局出版有限公司、民国历史文化学社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108、125、136~144、147~161页。

⑤政治大学人文中心主编:《民国三十年之蒋介石先生》上,台北:政大人文中心2016年版,第726页。

⑧⑨《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2月13、18日。

⑪⑬王文隆主编:《吴忠信日记》(1941),第168~169、165~166页。

⑫《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2月26日。按,马步芳提出抗战前线的骑兵第8师师长马彪年事已高,建议由第100师旅长马步康升充。12月27日,蒋介石决定同意马步芳的请求。

⑬《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2月31日。

⑭1941年3月,甘肃油矿局正式成立,玉门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石油工业的基地。

⑯马步青的骑第5军第5师一部是1941年3月才到此接防的,原驻安西、敦煌和玉门的马步芳第100师各部开往张掖的临泽、高台两县,即这支部队驻防此地仅一年多时间[参见《蒙藏委员会派驻新疆天山调查组代理组长王泽戎报送调查

西北政治经济军事的煌字第二十六号报告及蒙藏委员会复电》(1941年4月30日—5月20日),马振犊、苗普生主编:《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第27册(1928—1949),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52页]。

①⑦具体过程和细节,参见闫天灵:《1941—1942年河西走廊驻军大换防考实》,《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58~60页。不过,其中关于河西换防的高层决策和1941年酒泉换防的时间还可继续讨论。

⑧《蒋中正电马步芳》(1942年5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本文所用档案,如非特别标注,均出自该处,下文不再一一标注)，“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070200-00014-100。

⑨《蒋中正电令》(1942年6月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010300-00049-003。

⑩《蒋中正电勉马步青》(1942年7月1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010300-00049-055。

⑪⑫⑬《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8月19、20、22日。

⑭政治大学人文中心主编:《民国三十一年之蒋介石先生》下,台北:政大人文中心2016年版,第49页。

⑮《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8月23日。

⑯⑰⑱⑲⑳㉑㉒《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8月28日、8月29日、8月29日、6月30日、8月29日、8月31日、9月13日。

㉓胡宗南:《胡宗南先生日记》,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148页。

㉔《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9月1日。按,此处蒋介石将上一次巡视西北的时间误记为民国廿四年,实际为民国廿三年,即1934年。

㉕㉖政治大学人文中心主编:《民国三十一年之蒋介石先生》下,第267、268、248、268页。

㉗关于新疆哈萨克人入甘问题,相关研究有徐世华:《抗战时期哈萨克人入甘初探》,《西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第7~13页等。本文利用国民政府中央层面的档案展开进一步探讨。

㉘㉙《哈萨克人入甘青纪要》(1942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66~868、869~871页。

㉚王文隆主编:《吴忠信日记》(1941),第122页。

㉛马铃柳:《哈萨克人入甘续记》,《新西北》第7卷第5期,1944年5月15日,第40页。

㉜1941年12月,哈萨克人扰乱甘新公路,经骑第5师师长马呈祥亲自率兵围剿后平息[参见《朱绍良电蒋中正》(1941年12月3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090102-00016-144]。1942年3月,28名哈萨克人抢去玉门油田用来运煤的32只骆驼,双方激战1小时,油田方面的1名押运兵受伤[参见《油矿探勘与开采(一)》(1938年4月23日—1942年4月22日)，“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01-113230-0001,第131页]。

㉝《蒋中正电朱绍良》(1942年1月1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090102-00012-147。

㉞《蒋中正电朱绍良》(1942年4月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090102-00012-151。

㉟《朱绍良电蒋中正》(1942年4月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090102-00012-152。

㊱《谷正伦电蒋中正》(1942年5月1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090102-00016-141。

㊲政治大学人文中心主编:《民国三十一年之蒋介石先生》上,第483页。

㊳《谷正伦电蒋中正》(1942年5月2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090102-00016-142。

㊴《哈萨克人入甘青纪要》(1942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4),第873页。

㊵马铃柳:《哈萨克人入甘续记》,《新西北》第7卷第5期,1944年5月15日,第41页。

㊶李敬宝、苏复涛、李正科:《杨德亮在西北》,政协甘肃省酒泉市委员会编:《酒泉文史资料》第8辑,酒泉:酒泉市印刷厂1995年印刷,第53~54页。

㊷《行政院关于增拨安抚哈密期间经费致蒙藏委员会训令》(1944年7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4),第878页。

㊸《朱绍良电蒋中正》(1944年6月26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060100-00189-026。

㊹1943年3月22日,向达在致曾昭燏的信中写道:“冰谷县长来言:距千佛洞南三十里之大泉,已发现哈萨。嘱勿遽上山,云云。关外闻哈萨,几于谈虎色变。”1943年4月1日,向达又在信中写道:“三月廿二日,哈萨数人,已至千佛洞张氏所编一号洞前,执一挖金者,询千佛洞情形。”(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717~718页)

㊺《夏鼐日记》卷3(1942—1945),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248页。